

· 文献学研究 ·

论《四库全书总目·凡例》对圣谕修书意见的呼应

——兼论《四库全书》的修书用意

顾一凡

(南开大学文学院 天津 300071)

摘 要:《四库全书总目》主要由经、史、子、集各部的大序,各小类的小序以及诸书提要组成,而无全书总序。但是,卷首所载的历次圣谕实际上充当了全书的总序,《四库全书》就是在圣谕修书意见的指导下完成编纂的,这一点在凡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二十则凡例中,有八则是对历次圣谕所传达的修书意见的呼应。探究圣谕中所传达的修书意见以及凡例对此的呼应,亦可以管窥乾隆皇帝修纂《四库全书》的真实用意。

关键词:《四库全书总目》;圣谕;凡例

中图分类号: G257.3

文献标识码: A

Explanatory Notes of the *Catalogue of Complete Library in the Four Branches of Literature* Responding to Opinions of Imperial Edicts: On the Intents of Compiling the *Complete Library in the Four Branches of Literature*

Abstract The *Catalogue of Complete Library in the Four Branches of Literature* is composed of prefaces of classics, history, philosophy and belles-letters, prefaces of subcategories and abstracts of all books, but has no general prefaces. However, the imperial edicts recorded in the beginning of each volume serve as a general preface. The *Complete Library in the Four Branches of Literature* was compiled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se imperial edicts, which can be seen clearly from the explanatory notes. Among the 20 notes, eight responded to opinions of the imperial edicts. An exploration of the opinions and responsive explanatory notes will help to understand Emperor Qianlong's intents of compiling the *Complete Library in the Four Branches of Literature*.

Key words *Catalogue of Complete Library in the Four Branches of Literature*; imperial edict; explanatory note

《四库全书总目》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为完备的朝廷官簿,收书多达万余种,基本涵盖了清乾隆朝之前所有重要的古籍,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目录学的集大成之作。全书以经、史、子、集四部为纲领,各有大序;四部之下又约分小类,各有小序。这些大、小序加上诸书提要,共同构成了这部目录学巨著。但与历代官修目录书略有不同的是,《四库全书总目》以凡例起始,并无特意撰写全书的总序。徐有富先生曾在《目录学与学术史》中提到这一现象,他认为:“《总目》没有序,卷首《圣谕》实即《总目》之序。”^[1]这一看法是十分精

当的,而卷首所载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二月二十三日的圣谕也可以解释未撰写全书总序的原因:“《四库全书》体大物博,将来成书之日,篇帙浩繁,举何为序?所有历次所降谕旨刊之《总目》卷首以当序,事属可行,且官撰著书亦有以谕旨代弁言者,自不得不如此办理。”^{[2][13]}由此可见,并非未撰写总序,实是有意为之,以圣谕代替全书总序。那么,为什么关于修纂《四库全书》的历次圣谕可以被视为全书总序呢?大致有3点原因:首先,乾隆皇帝对修纂《四库全书》认识的不断加深,均以历次圣谕中所透露的修书用意为参

照^①；其次，各种体例的采用，譬如编排次序、版本著录、提要撰写，均以历次圣谕所传达的修书意见为指导；最后，对著录书、存目书的去取、酌改甚至销毁，均以历次圣谕中所隐含的修书理念为标准。可以说整部《四库全书》都是围绕着圣谕的修书意见进行编纂工作，而最能集中、直观地反映这一点的便是《四库全书》的凡例。二十则凡例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对圣谕修书意见的呼应和执行。于是，深刻理解圣谕的修书理念以及凡例对圣谕的呼应，既可以探寻乾隆皇帝对修书工程的意图，又可以从馆臣（或称皇家学派）的角度对圣谕有新的认识和思考。因此，本文将着重考察圣谕提出了哪些修书意见以及凡例如何执行这些修书意见，并从中管窥乾隆皇帝对于修纂《四库全书》的用意。

1 圣谕中传达的修书意见

《四库全书总目》卷首所载圣谕，武英殿本有20则，浙本有23则，下文均依据武英殿本进行考察^②。诚如上文所言，乾隆皇帝对修纂《四库全书》的认识不断加深，愈加坚定编修这一巨著的决心，因此为了清晰、直观地看出乾隆皇帝的整个认识过程，以下试将修纂《四库全书》的过程分为两阶段，归纳出这两个阶段里乾隆皇帝所传达的具体的修书意见。

1.1 第一阶段：访书与辑佚

从历次圣谕来看，乾隆皇帝并非一开始就有编纂《四库全书》的意愿，起初乾隆皇帝只是致力于倡导文治，稽古右文，因此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正月初四日下旨按重要程度^③不同购访藏书，以彰千古同文之盛。又因为朱筠上疏，意在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旧书。乾隆皇帝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十一日的圣谕中应允这一提议，并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初六日下旨，不但要求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书，并且要效仿内府藏本，摘叙各书要旨。随后，乾隆皇帝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十一日的圣谕中还指出类书有贪多务得、体例未允的弊端，辑出的书应以四部分类汇总。此外，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五月十七日的圣谕中，乾隆帝还提出所辑之书应当择善誉录，而俚浅者只存书名，这为日后将所辑之书分为应刻、应抄、应存三类以及编纂《四库全书》时将书籍分为著录书和存目书二类的做法埋下伏笔。

数月之后，乾隆皇帝亲览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书，并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八月二十五日的圣谕中表示认可这些书目的编排体例和提要的撰写。

与此同时，搜访旧书的工作还在继续，乾隆皇帝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五月十四日下旨表彰进书较多的藏书家，赐《古今图书集成》《佩文韵府》，希冀其他藏书家能够踊跃献书。又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七月二十五日再次表彰进书较多的藏书家，赐名“藏书之家”。除此之外，还提出编纂《四库全书》提要的具体要求，并着手编纂《简明书目》。

乾隆四十年（1775年）十一月十七日，乾隆皇帝批阅所辑之书，发现书中有青词一体，词涉异端，应全部删去，以彰悉归雅正、鉴古斥邪之意。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六月初一日受所辑之书启发，下旨任命修书官员。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七月二十六日下旨，抄录《四库全书》时，将关帝谥号改易为忠义。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九月三十日降旨，将《四库全书总目》^④及提要编次刊行。

以上圣谕所反映的修书工作均属第一阶段，此阶段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搜访旧书和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旧书。由此可见，进一步搜访旧书的关键在于鼓励各地藏书家进书，而从《永乐大典》中辑书则初步反映了乾隆皇帝追求雅正忠义、大公至正的文治思想。

1.2 第二阶段：校勘与酌改

因各省遗书送到，乾隆皇帝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十一月十七日下旨，要求区别甄核进呈书籍，酌情改易或销毁，以彰大公至正之心。与此同时，乾隆皇帝也亲览进呈的遗书，譬如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十月初七日降旨，书中直呼汉武帝的名讳，于理不顺，故酌情改称为汉武。又如馆臣为求避讳，篡改儒家经典中所出现的“夷狄”二字，故乾隆皇帝特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十一月十四日降旨要求馆臣悉为更正，毋再轻率改字。再如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二月二十六日降旨，认为馆臣选出的违碍应毁书中亦有切中时弊、匡正时艰者，毋庸销毁，应酌情改易。由此观之，乾隆皇帝的确披阅了大量书籍，正如凡例中认为《四库全书》与“泛称御定者迥不相同”^{[2]34}，此言不虚！

《四库全书》初稿约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完成，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九月十七日时，或已大致完成，因而下旨编纂《历代职官表》，以示沿袭

正统,并列入《四库全书》刊行。此外,也许因为编修工作接近尾声,乾隆皇帝及馆臣开始思考编排次序问题,如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二月十三日降旨,将列朝御纂、御批、御制各书分列各家著撰之前;将卷首所录乾隆御题四库诸书诗文撤出,分列御制诗文集之前,以彰大公至正之意。但两天后,即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二月十五日,乾隆皇帝再次降旨,认为之前圣谕旨意于体例未协,应当按照撰述人生卒年份的先后顺序依次编纂。最终,馆臣正是依此旨意编排《四库全书》次序。

编修工作临近收尾时,乾隆皇帝对修书的认识已经成熟和完整了,对著录书目的去取与酌改已经十分熟稔了。譬如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月十六日降旨,称《契丹国志》“体例混淆”,当加以厘正;又如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月二十七日降旨,称明臣奏疏切中时弊,有裨本朝,不可以人废言,以求大公至正。再如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一月初六日降旨,要求撤出八咏诗之类有乖雅正的诗歌,当采有关世道人心的诗文。

以上是圣谕中反映的修纂《四库全书》的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开始由对《永乐大典》的辑书转向对访求得来的遗文旧书进行校勘考察,对一部分有违碍字眼的内容酌情改易,对有乖雅正、有害于世道人心的书悉数删去不录,以此彰大公至正之善。当然,列于卷首的圣谕本身就是被美饰过的文化政策宣言,实际编修《四库全书》过程中所改、所删、所禁、所毁之书不胜枚举,其原因也许只是莫须有地影响清王朝统治,因而被删,所以圣谕所说诸如“大公至正”“衡鉴千秋”之类的说法不能完全相信接受,而要理性客观地看待。

2 凡例对修书意见的呼应

诚如前文所说,凡例是整部《四库全书》中最能集中反映馆臣对圣谕修书意见执行的部分。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3点:

(1)所谓凡例,顾名思义,即发凡起例,今多指书前说明本书内容或编纂体例的文字^{[3]285}。上文提到整部《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都是围绕圣谕为核心展开的,那么,作为精要地说明整部书内容及体例的凡例,应当能够最为集中地反映这部书的指导思想,即

圣谕的修书意见。

(2)伴随着乾隆皇帝对修书认识的不断深化,《四库全书》的体例也是随之而变化的,而体例最后定稿为凡例,因此可以说凡例是圣谕修书思想的最终形态。譬如乾隆皇帝对于御制诗文编排次序问题的思考逐渐深入,最终得出合乎体例、合乎历史规律的做法,凡例则顺应乾隆皇帝的旨意,以乾隆皇帝提出的编排次序为准。

(3)凡例由四库馆臣,特别是一批精通目录学、考据学的学者,结合多年修纂经验,汇总拟定而形成的。既有圣谕思想的指导与干预,又符合学术,特别是目录学本身的固有规律。既有推崇文治、政治百姓的意味,又可以视作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治学坦途。既有帝王高屋建瓴地把握全局,又经过朴学家扎实的考据和不懈的努力而付诸实践。因此凡例既可以说是馆臣对圣谕的执行,亦可以说成馆臣对圣谕理解之后的再创造和实物化。

由此观之,凡例应当最能集中精要地反映圣谕所透露出的修书思想,也最能呼应圣谕中所传达的修书意见。凡例共有二十则,概括来说,即亲览圣裁,文治之功;乾隆御撰,仍从四部;特创新规,等差有辨;据典立目,择善而从;约分子目,条理秩然;考校原书,不失其真;注明底本,先后为序;笺释从注,辑旧为述;各撰提要,巨细不遗;源流正变,分并改隶;姓名爵里,不复赘述;考证精核,倡导实学;敦崇风教,去取谨严;摒弃空言,务求实用;杜绝朋党,务核其真;文德两分,彰善癉恶;采录协中,兼收并蓄;伪书录存,讹妄注明;九流方技,不以为重;已有定论,不复赘议。以上二十则凡例并非全部与圣谕一一吻合,上文也提到了凡例还是要注重目录学本身实际情况,对一些具体专业的学术问题,乾隆皇帝没有圣谕中提到,但凡例却不能不列出。除此之外,有八则凡例可以直接从圣谕中找到源头和依据,因此特在表1^⑤中列出,可以更加直观地看出凡例对圣谕修书思想的呼应和执行情况。

除了上表中列出的八条凡例外,还有十二条凡例并未在圣谕中被明确地提到,分别是:据典立目,择善而从;约分子目,条理秩然;考校原书,不失其真;笺释从注,辑旧为述;源流正变,分并改隶;姓名爵里,不复赘述;考证精核,倡导实学;摒弃空言,务求实用;杜绝朋党,务核其真;采录协中,兼收并蓄;伪

表1 凡例对圣谕修书思想的执行

圣谕	凡例
举何为序?所有历次所降谕旨刊之总目首卷以当序,事属可行。	谨录历次恭奉圣谕为一卷,载诸简端。
着将所进诗文六卷撤出,仍分列入朕御制诗文集内,俾各为卷首,则编排在列朝钦定诸书之后。	而我皇上道秉大公,义求至当……特命各从门目,弁于国朝著述之前。
择其中罕见之书,有益于世道人心者,寿之梨枣,以广流传。余则选派誊录汇缮成编,陈之册府。其中有佞浅伪谬者,止存书名,汇为总目,以彰右文之盛。	其上者悉登编录,罔致遗珠。其次者亦长短兼录,见瑕瑜之不掩。其有言非立训义或违经,则附载其名兼匡厥缪。至于寻常著述……亦并存其目以备考核。
一人而收藏百种以上者,可称为藏书之家,即应将其姓名附载于各书提要末。	每书名之下,钦遵谕旨,各注某家藏本,以不没所自。
……俱照各按撰述人代先后依次编纂,至我朝钦定各书,仍各按门目,分冠本朝著录诸家之上。	《隋书经籍志》以帝王各冠其本代,于义为允,今从其例。其余概以登第之年、生卒之岁为之排比。
……各条下俱撰有提要,将一书原委撮举大凡,并详著书人世次爵里……	今于所列诸书,各撰为提要,……先列作者之爵里以论世知人……
其中有青词一体,乃道流祈祷之意,非斯文正轨。	宋人朱表青词亦概从删削,其倚声填调之作……并蒙皇上指示,命从屏斥。
即或其人品谊未醇,……亦不可以人废言。	文章德行自孔门既已分科,两擅厥长,代不一二。
其历代流传旧书,内有阐明性学治法,关系世道人心者,自当首先购觅。	盖圣朝编录遗文,以阐圣学明王道者为主,不以百氏杂学为重也。

书录存,讹妄注明;已有定论,不复赘议。

这十二条凡例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目录学分类的原则标准,包括设立小类与子目、考核旧书原旨、编排次序问题、大小序及提要的撰写、采录书籍的标准、伪书的录存等问题;另一类则有关治学理念,比如提倡实学,又如杜绝朋党,再如不做翻案工作,遵循定论等。诚如上文所言,这些治学理念或者修纂目录学的细节,并不是乾隆皇帝的关注重点。然而这十二则凡例是否就脱离了圣谕的指导思想,成为单纯的学术观点了吗?实则未必,举例来说,乾隆皇帝下旨编纂《历代职官表》,以示沿袭正统,那么据历代正史艺文志立目,是否也有如此用意?再举一例,圣谕中反复提到“大公至正”的修书理念,因而在采录书籍时修纂者便以此为标准,凡离经叛道之伦皆不采录,凡有裨实学之言亦不湮没,既选择学术正统者收入《四库全书》,又对各家的学说予以保留,力求做到“大公至正”。要言之,凡例二十则其实均是在圣谕的指导下拟定的,有些非常明确地执行了圣谕的修书意见,另外数则凡例则暗含了圣谕的理念,同时也呼应了乾隆皇帝真实的修书用意。

3 圣谕反映出的真实修书用意

上文详述了历次圣谕中的修书意见以及凡例对圣谕修书意见的呼应。由此观之,无论是乾隆皇帝先后降旨20余次,并且抽阅大量进呈书籍,还是馆臣忖度圣谕中的修书意见,并且耗费大量时间精力去完成这部目录巨著,《四库全书》的修书用意都值得深入思考和讨论。一批学者认为乾隆皇帝修书意在禁毁民间遗书,譬如鲁迅先生就曾在《病后杂谈之余》中提到:“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4][9]}诚然,修纂《四库全书》禁毁了大量书籍,篡改旧书之例更是不可胜数,但禁毁与篡改是修书过程中带有政治色彩的行为,是实然的结果,而乾隆皇帝无论是起初从《永乐大典》中辑书或是修纂《四库全书》,其用意绝不仅限于此,应然的、理想的修书活动应该以圣谕中的修书意见为参照,并从中管窥乾隆皇帝真实的修书用意。

通览20则圣谕,其中反复提到过几个词汇,如“稽古右文”“大公至正”。起初这些概念或许只是无意提起,但愈往后,特别是《四库全书》接近完稿时,这些词汇不但被多次提及,而且皇帝也以此作为文化政策去衡量四库馆进呈的书籍,再参照凡例对圣谕中重要旨意的呼应,可以试着推测这些词汇或政策也许才是乾隆皇帝的真正修书用意,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3点:

(1)乾隆皇帝修书是为了倡导文治,教化人心。清朝满族统治者虽以八旗铁骑征服了中原,但并非像元朝早期那般不重视文治。与此相反,自顺治帝入关以来,历代清朝皇帝都以文治作为施政的方针,以笼络士子之心,达到维护统治的目的。举例来说,清朝首位入主中原的顺治皇帝曾谈到:“今天下渐定,朕将兴文教,崇经术,以开太平。”^[5]以文教化,尊儒尊经,以求太平。康熙皇帝也继承了这一施政方针,他认为:“治天下以人心风俗为本,欲正人心,厚风俗,必崇尚经学。”^[6]将“治天下——民风、人心——尊经”联系起来,意图了然。到雍正皇帝时,他对文治的看法更加深刻,他认为:“若无孔子之教,则人将忽于天秩天序之经,昧于民彝物则之理,势必以小加大,以少凌长,以贼妨贵,尊卑倒置,上下无等,于名犯分,越礼悖义,所谓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

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其为世道人心之害,尚可胜言哉?”^[17]此时,清朝统治者已经能够看出以儒家文化为主的文化政策对于教化世道人心、长幼尊卑有序、国家长治久安大有裨益。而乾隆皇帝对这一施政方针的认识则更进一步:一方面,乾隆帝尽力宣扬、渲染乾隆朝文治之盛,营造出文化昌明的景象。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正月初四日,即《永乐大典》辑书伊始,乾隆就降旨称:“朕稽古右文,聿资治理,几余典学,日有孜孜。……正宜及时采集汇送京师,以彰千古同文之盛。”^[21]随后,乾隆皇帝又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五月十七日的圣谕中反覆阐明“以彰右文之盛”的修书用意^[24]。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七月二十五日颁行的圣谕中传达了“用昭我朝文治之盛”的修书意图与初衷^[25]。另一方面,乾隆帝以修纂《四库全书》为依托,大力鼓吹有益于世道人心的旧书遗文,从而践行文治、教化民众的文化政策。圣谕中多次提到应当收录有益于世道人心者,譬如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正月初四日降旨:“其历代流传旧书,内有阐明性学治法,关系世道人心者,自当首先购觅。”^[21]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五月十七日下旨:“择其中罕见之书,有益于世道人心者,寿之梨枣,以广流传。”^[24]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一月初六日降旨,称:“朕辑《四库全书》当采诗文之有关世道人心者。”^[215]由此观之,乾隆皇帝无论是听从朱筠上疏、从《永乐大典》中辑书,还是进一步编纂《四库全书》,其实际用意都是沿袭清朝既定的文化教化政策,倡导文治,以文安天下、求太平,因而对于有益于教化世道人心的书籍也就格外看重。

(2)乾隆皇帝修书也有嘉惠艺林、启牖后学之意。《四库全书》作为官修目录的集大成者,与其他官修目录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四库全书》修纂工作结束后,并非秘不示人,藏诸深宫,而是放置七阁以示人,“南三阁”甚至准许士子赴馆阅录。尽管有的学者认为此举可以愚化士子,甚至如鲁迅先生所说:“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4191]但此举无疑打破了传统官修书目秘不示人的积弊,使广大学子能够从中受益。乾隆皇帝在历次圣谕中非常明确地提到了这个问题。譬如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五月十四日下旨:“国家当文治休明之会,所有古今载籍,宜及时搜罗大备,以光册府,而裨艺林。”^[24]不但充实内府藏

书,更欲使天下学子受益。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六月初一日下旨:“至于四库所集多人间未见之书,朕勤加采访,非徒广金匱石室之藏,将以嘉惠艺林,启牖后学,公天下之好也。”^[217]打破官修目录秘不示人的窠臼,愿与士子公天下之好。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九月三十日再次降旨:“凡所藏书皆成善本,亦以示嘉惠士林至意。”^[217]总体看来,嘉惠艺林、启牖后学,一方面仍是为了彰显乾隆朝文治之盛;另一方面,此举透露着乾隆皇帝笼络知识分子、教化其守正志学的深刻用意。

(3)乾隆皇帝在修书过程中着力阐发其衡鉴千秋、大公至正的文化政策。乾隆皇帝常以“大公至正”为理由确定《四库全书》中的某些体例,改易进呈书籍中的某些“于理不顺”之处,甚至改易违碍字眼、禁毁某人的著述。实际上,乾隆皇帝衡鉴千秋所持准绳并不一定“公”“正”,但却是出于维护统治、表明正统的政治目的,大抵是无可厚非的。试举关帝谥号一例,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七月二十六日的圣谕中,乾隆帝认为“关帝在当时力扶炎汉,志节凜然,乃史书所谥,并非嘉名。陈寿于蜀汉有嫌,所撰《三国志》多存私见,遂不为之论定,岂得谓公。……今当抄录《四库全书》不可相沿陋习,所有志内关帝之谥,应改为忠义。”^[217]再如乾隆帝认为书中直呼汉武帝刘彻名讳不妥,应酌改为汉武。乾隆皇帝作出这些改易,虽然打着衡鉴千秋、大公至正的旗号,但实则应当是出于维系清朝正统地位、维护统治合法性的目的。

总而言之,乾隆皇帝修纂《四库全书》并非是一场单纯的“文字清查工作”,而应该是出于倡导文治、嘉惠艺林、衡鉴千秋的修书用意。当然,这3点只是修书的理想状态,实际上作为官修目录,修纂工作不免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从而出现了改易、禁毁大量书籍的文化浩劫,如同硬币之两面难以避免。

4 结语

综上所述,《四库全书》卷首所载历次圣谕提出了许多修书意见,多精当恳切;包涵了丰富的修书思想,可以充作全书总序。而全书凡例则倾力执行了修书意见,呼应了乾隆帝的修书用意,因此将凡例与圣谕对照考察,可以从馆臣的角度更加深入地理解圣谕。在这一互动过程中,乾隆皇帝修纂《四库全书》的

用意似乎可以推测,即倡导文治、嘉惠艺林、衡鉴千秋。尽管在实际编纂工作中出现了篡改、禁毁书籍的悲剧,但乾隆皇帝的修书本意以及文治功绩应值得肯定。

注释:

- ① 主要指从最早的圣谕来看,乾隆皇帝似乎并无编修《四库全书》的用意,只是为了“稽古右文”,推行文治,于是搜罗遗书,以彰千古同文之盛。后因朱筠奏请从《永乐大典》中辑书,乾隆认为类书体例未允,应当“以经史子集为纲领”,加之进呈书目愈多,因而才产生了编修《四库全书》的想法。因此,参照二十则圣谕,可以了解乾隆皇帝对编纂《四库全书》的认识是逐渐深化的,并愈加认识到这一文化工程的重要性。
- ② 浙本多出的三则圣谕对本文考察的重点影响较小,为了简省,故采用武英殿本。
- ③ 所谓“重要程度”,细言之,“阐明性学治法,关系世道人心”者最为重要,“有裨实用”者次之,而历代名士文集则“均应概行查明”。
- ④ 此处所谓《四库全书总目》只是《永乐大典》所辑之书的目录,并不是最终编纂成书的《四库全书总目》。
- ⑤ 圣谕与凡例的原文均出自文渊阁《四库全书》,于表内恕不复注。

参考文献:

- [1] 徐有富.目录学与学术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9:331.
- [2] 纪昀,等.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 [3] 罗竹风.汉语大词典:第二卷[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86:285.
- [4] 鲁迅.鲁迅全集:第六卷 且介亭杂文[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5] 赵尔巽.清史稿·志八十一·选举一·学校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6:3114.
- [6] 清代实录馆.清实录·圣祖实录:卷二五八[M].北京:中华书局,1985:552.
- [7] 清代实录馆.清实录·世宗实录:卷五九[M].北京:中华书局,1985:905.

作者简介: 顾一凡(1994—),男,南开大学文学院中国古典文献学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目录学。

收稿日期: 2017-05-18